

# 灾难叙事与小镇里的中国 ——评路内《雾行者》

聂章军

(河北大学, 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雾行者》起始于1998年的洪水, 结束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爆发前十几天。洪水、暴雪、非典、矿难、9·11, 对灾难的书写贯穿小说始终, 体现的是作者对于文学本身和现实人生的思考。小说中时刻存在的危险是为了营造“不确定感”, 反映的是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境况和心理写照。《雾行者》表现了小镇里的中国, 在318国道沿途的城市、小镇中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横切面, 以及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小镇现状。“江湖儿女”和“小镇青年”是《雾行者》的两个关键词。小说展现了“江湖”的秩序与混乱, “江湖儿女”漂泊的命运和他们躁动的“英雄梦”。随着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 《雾行者》中描绘的是最后的“江湖”。

**关键字:** 路内; 《雾行者》; 灾难叙事; 小镇文学

## Disaster narratives and representing China through towns:

### Review of *Wu Xing Zhe* by Lu Nei

Nie Zhangjun

(Nie Zhangjun Baoding Hebei University, Hebei, China)

**Abstract:** *Wu Xing Zhe* began with the floods in 1998 and ended more than ten days befor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Floods, blizzards, SARS, mining accidents, and 9/11, the writing of disasters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novel, reflecting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literature itself and real life. The constant danger in novels is to create a sense of uncertainty, reflect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portrayal of people in this era. *Wu Xing Zhe* portrays China in towns, showcasing the cross-se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long the 318 National Highway in cities and towns, as well as the large-scale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owns in China during the high-speed urbanization process. "Jianghu children" and "town youth" are two key words in "Wu Xing zhe". The novel portrays the order and chaos of the "Jianghu", the wandering

---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北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新时代文学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5211002251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聂章军, 男, 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fate of the "Jianghu children" and their restless heroic dreams.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hina's legal system, *Wu Xing Zhe* depicts the final 'jianghu' of China.

**Key words:** Lu Nei; *Wu Xing Zhe* (《雾行者》); Disaster Narrative; Town Literature

《雾行者》故事的时间线是1998-2008年，起始于98年的洪水，结束于08年4月底，即汶川大地震爆发前十几天。灾难在路内的小说中时常作为或隐或显的背景出现，比如《少年巴比伦》中的大爆炸和地震，《天使坠落在哪里》中的洪水以及《慈悲》中的饥荒。《雾行者》中的灾难叙事则更为典型，洪水、暴雪、非典、矿难、9·11，这些灾难没有直接对人物产生影响，而是营造了一种危险而感伤的氛围。灾难是时代的痕迹与伤痛，思考时代的伤痛是作家的良心。《雾行者》的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第一代年轻人开始进入社会。时值国有企业改革下岗潮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凸显。《雾行者》从小镇视角为观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一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乡土文明的冲击；二是随之而来的青年问题。

## 一、小镇视野下的中国社会横切面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高速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表现。到2020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60%，城镇人口已超越农村人口。作为《雾行者》时间线的1998-2008年，正是中国城镇化增速最快的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巨变的乡村和崛起的城市之间，小镇的结构变迁同样值得关注。可以说，在“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之间，还有一个“小镇中国”。

“小镇中国”的独特视阈自然难逃作家们的法眼，小镇屡屡成为他们“想象中国”的文学地理空间。路内便试图通过小镇这一有限的空间，透视无限的时间领域，来表现中国的社会现实。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文学里中国的小镇也出现了双重印象：一方面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种种现代诱惑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乡土中国传统的一面仍然是小镇文化底层的基因。《雾行者》中由众多小镇勾连起的中国，在小镇视野下观察“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相较于此前的中国小镇文学具有独特性，比之路内自己的“小镇文学”也有一定突破，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一，《雾行者》大致沿北纬30度线，在沿途的城市、小镇中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横切面。《雾行者》有着扩卓的地理版图，上海、铁井镇、临平镇、李河镇（傻子镇）、E市、T市、H市、无锡、重庆、綦江、西藏，沿318国道——这条中国最长的公路——横穿整个中国。

小说中作者借端木云如此表述道：“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沉入海洋，由东向西穿越国境。”<sup>[1]</sup>《雾行者》文学地理版图的开阔，带来的是小说视野的广阔。上海、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像是中国社会的盆景，集中展现了中国光鲜亮丽、现代发达的一面；而铁井镇、李河镇这样的小镇、县城则更像是中国现实的纵深横切面，这里丰富多彩也鱼龙混杂。路内巧妙地选择了仓库管理员作为两位主角周邵和端木云的职业，他们辗转于全国不同的货仓，贯穿中国的叙事线索得以草蛇灰线般徐徐铺开。

随之带来的是“路小路”形象——这一路内笔下多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延伸。周邵对于辛未来，仍然是一路“追随她的旅程”，始终没有走出困境，周而复始又回到原点；而端木云则是一路奔向远方。一开始是端木云跟随周邵来到了铁井镇，入职美仙公司。当周邵心生离开之意，与端木云商量离职换个地方闯荡，这时反倒是端木云不愿离开，因为他马上就将得到去重庆的机会。端木云以“云”为名，注定漂泊，最终他也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脚下获得了解脱。如果说周邵的形象是路小路的延伸，端木云的形象则有了全新的意味，在他身上体现了对现实、命运的抗争。在端木云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抗争，命运由环形转为了线性，主动卷入命运之中，义无反顾地向前。

二，表现了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小镇现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小镇发展为了县城、城市，进入“无土时代”。而正在发展中的小镇，作为乡土中国与城市文明的中间地带，面对城市狂飙突进式的发展，乡土文明转型也面临了一些道德、文化困境。在小镇的天平的两端，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开始向后者倾斜。面对这种变化，河北作家张楚这样写道：“县城发生变化是近十年的事。……就像《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小镇一样，这个县城越来越光怪陆离越来越饕餮好食，空气中的味道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前灰扑扑、干燥，但骨子里却有种干净的单调和明亮，我相信那不是气候的缘由，而是人心的缘由。”<sup>[2]</sup>

《雾行者》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小镇，铁井镇、李河镇（傻子镇）、临平镇、万县、綦江、聂拉木以及类似小镇规模的开发区、矿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铁井镇和傻子镇。铁井镇是小说故事发生、发展的主要舞台。它位于上海、江苏、浙江的交界处，一条省道从小镇穿过，将它和上海连接起来。铁井镇最初只有一万居民，1995年成立开发区，大量企业开始入驻；1996年，数万名打工仔从全国各地来到小镇；1997年，小镇的人口已经增长了五倍，治安开始急剧下降；到了小说末尾的2008年，铁井镇已工厂连片，俨然城市的模

样。作者谈到，铁井镇的现状可能也是中国的普遍状况。年轻人不遗余力地离开农村，投入全球化，投入报酬低微的流水线，相比于农村，这点报酬又显得丰厚，让他们暂时满足。铁井镇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时代缩影。傻子镇则更像是发展的对立面，是经济发展中被遮蔽、被忽略的一面。傻子镇原名李河镇，不知什么原因出产各种智障，久而久之被叫成了傻子镇。镇里的正常人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了傻子和老弱妇孺。作者借此表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的泥沙俱下。

三，正面展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路内是始终关注人口流动问题的作家，一方面，90年代出现的进城打工潮，7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是亲历者，也是他们深刻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到远方去”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时代梦想。进城是时代的主潮。“安土重迁”并非国人性格中的全部。海外汉学家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提出，“移民”或“流动”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策略。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记载史不绝书。“在那些因田地不足而生计难以为继的地区，的确有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做出了远走他乡的决定。无论是劳动力外出，或是举家搬迁，如此生存策略无疑令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国度的传统说法黯然失色。”<sup>[3]</sup>“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即使身在千里之外仍与故乡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雾行者》中，周邵对辛未来说，那座小镇是他象征意义上的故乡，是我们死后都要回去的地方。如今，中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常态。随着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动辄几亿人次的旅客发送量我们也习以为常。乡土变为故土，路内笔下的“行者”们是远离故乡的一代人，那些乡村、小镇已变为他们的精神寄托。

## 二、“江湖儿女”与小镇青年

“江湖儿女”这个词在《雾行者》中反复出现，洒脱中带着苦涩与无奈。自诩为“江湖儿女”，无非是市井之中的漂泊之人。我们通常所说的“江湖”其实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权力概念。因为处于“江湖之远”，“庙堂之高”才触及不到。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才会出现江湖。《雾行者》中，世纪之交的铁井镇，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面对数以万计来来去去的打工者，治安的管辖能力大大滞后，地方警力显得有心无力。周邵、端木云、林杰、鲁晓麦等等江湖儿女，比之国家法律，他们更看重江湖道义，守的是江湖规矩。不过，鲜衣怒马、快意恩仇是武侠小说中的江湖。《雾行者》中也有报仇，但当“江湖霸主”一样的杨雄被矮他几十厘米的猪仔所杀，“江湖”只剩下了反讽的意味。小镇青年成为了“江湖儿女”，

实质是社会出现了问题。

“江湖”自然也与暴力相连。《十七岁的轻骑兵》中不服管的十七岁，青春似乎只剩下爱情和打架。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打打杀杀贯穿路内的每一部小说。《花街往事》中的“文革”武斗，《云中人》里的扛着榔头的杀人犯，《追随她的旅程》中的“少女帮”，《少年巴比伦》《慈悲》中工厂里的各种斗殴……然而这些作品中的“江湖”只停留在表层，或者说还无法称之为“江湖”。暴力终究只是“江湖”的一种表现。《雾行者》则是正面描写世纪之交中国的“江湖儿女”，这里的“江湖”也显得更加复杂：

首先，“江湖”的核心是秩序与混乱。“江湖”因为社会的失序而出现。《雾行者》的开篇是仓库管理员黄泳之死，而且此人是“假人”，即其参加工作时填报的个人身份是假的，这个人一旦消失便无从查证他是谁。这里便是社会失序的标志。作品中很多人物利用假的身份工作、逃走，主角周邵甚至随手一口气给自己买了三张身份证。混乱自然就会出现犯罪。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假人”，随之出现的便是利用职位便利而发生的犯罪，比如卷走50万货款的倪德国。二代身份证的出现是小说中的隐喻般的存在，此后“假人”犯罪再难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混乱终会归于秩序。

与秩序相关的是江湖中的权力。在公权力触及不到的社会底层，这些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会自发的形成某种秩序。铁井镇的各种工厂纠察队和保安队便是试图维持秩序的代表，然而这种维持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而暴力只会产生更多的报复与仇杀。保安队长杨雄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杨雄之名自然让人联想起《水浒传》中石秀与“拼命三郎”的称号，《雾行者》中的杨雄也确实如此，他身材高大魁梧，且擅长打架，喜欢打架，是一流的打手。林杰对杨雄的评价是，他人很正直，但同时很幼稚，打人不计后果。杨雄强烈感受着命运的不公，他对抗命运的方式，就是用拳头收拾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工厂里所有的人都怕杨雄，但这样的人只是看似拥有了权力。随着杨雄被人从背后捅死，也证实了靠暴力维持的权力其实不堪一击。

枪在《雾行者》中是权力的终极代表。拥有枪的人好像就拥有了权力。当火车上的劫匪摸到李勇军口袋里的手枪，便没有敢抢他的钱。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江湖儿女》中，廖凡饰演的“江湖大哥”斌哥说，江湖里有枪的人才死得快。枪是权力的体现，也是稳固“江湖”秩序的一种保证。然而权力总会更迭，另一个持枪者的出现，很快就会打破这种脆弱的权力平衡。《雾行者》中有枪的人几乎都死了，创立“十兄弟”的叶嘉龙被俞凡所杀，持枪报仇的林杰和俞凡都惨死街头。“江湖儿女”终究是没有权力的阶层，他们无法掌握这个

社会的资源，只是被动地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雾行者》中自以为掌握了权力的人都难逃横死的命运。周邵把端木云手里的枪扔进了嘉陵江，这大概也是莽撞的端木云能活到小说最后的原因。作品中借由不同角色之口强调同一个事实：持枪罪至少判五年，仿佛也是在说法治社会里“江湖”终将消失。

其次，“江湖儿女”有着躁动的英雄梦。“十兄弟”是《雾行者》中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十兄弟”最初由失业青年叶嘉龙在铁井镇创立，干些走私、打架的非法营生。后来赶上严打，“十兄弟”中大部分人或坐牢，或枪毙，或逃亡。虽然名存实亡，但因为“十兄弟”的名号叫得响了，很多小混混开始自称为“十兄弟”。而小说中真正写到的“十兄弟”是俞凡、杨雄、林杰、鲁晓麦、张泽华、傅民生、俞恒、徐丽萍、周伟彬等人。这些年轻人最初走到一起，与其说是为了挣钱，不如说是为了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喜欢吹嘘自己做过的“大事”，打过、捅过某个人，又或是身上有伤疤，这些是他们骄傲的资本。林杰说，林杰这个名字不是用来鸡鸣狗盗的，这也体现了“江湖儿女”卑微的尊严。其中，初衷不变，总想着“干票大的”的俞凡最为典型。俞凡可以说是“十兄弟”的实质领袖，黑神山的砖塔上俞凡的名字刻在最上面。然而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谈何容易，结果兄弟俞恒染上了毒瘾，俞凡自己成了低贱的皮条客。俞凡向叶嘉龙报仇的执念，毋宁说是在主动走向自我毁灭。

金钱是“江湖儿女”实现梦想的首要条件，所谓“闯江湖”，也无非是谋生手段。作为《雾行者》主线剧情开端的1998年，正值国企改革中的下岗潮，年轻人找份工作也并不容易。他们离开乡土，在小镇中见识到了商业浪潮冲击下的现代诱惑。一方面小镇中的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奋斗努力着渴望跨越身份的鸿沟；一方面又四处碰壁，无法在城镇立足。剧烈变革的社会中，道德出现了滑坡，有人开始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周邵说，他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去抢银行，因为我们所有人能想到的发财手段，都是低配版的抢银行。他也一直想着干票大的，比如把一车大理石偷着运出仓库卖了然后跑路，只不过每次想铤而走险的时候还是勉强保持住了理智。

最后，“江湖儿女”注定漂泊。《雾行者》中有着广阔的文学地理版图，这也使得漂泊与流动成了作品的主旋律。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漂泊的打工者与外来者：沦落街头的红围巾女孩凌明心，黄泳死后离开饭馆的胡小宁，喜欢着胡小宁的铁岭小伙子，在康孚龙公司做“糖葫芦女孩”的刘玲玲、吕莎莎等等打工妹，卖唱女孩飘飘，卷走50万货款的倪德国……他们来来去去，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群像。

火车有时也是发展的象征。林杰对梅贞说，他家乡的小镇不远处有一条铁路经过，但是没有站台，火车每天都从他头顶开过。他在这个镇上看火车，一看就是十几年。火车象征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个社会在飞速的前进，自己却在原地踏步。这列名为“发展”的列车上，没有自己的位置。这里没有站台，火车更不会为自己停留。少年们想要离开家乡的小镇、县城，到远方追逐自己的梦想，但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林杰的结局是在逃亡中被射杀在火车站，这大概便是“江湖儿女”的某种宿命吧。

世纪之交是观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节点，社会的失序终究是暂时的，“江湖”也只在这一时期的小镇中短暂存在。中国的法制正逐步完善。随着小说的深入，那些亡命徒一个个或落网，或横死，“江湖”也慢慢消失。《雾行者》中描绘的实际是最后的“江湖”。

### 三、与危险共存的灾难叙事

《雾行者》由五章构成，其中前四章都是由灾难、事故开头：第一章《暴雪》即以灾难为题，开头是一起意外身亡的事件，和潜在的非典刚刚结束的背景；第二章《逆戟鲸》开端是一九九八年，洪水泛滥的夏季永远留在端木云的记忆之中；第三章《迦楼罗》开头是一场大火和两起命案；第四章《变容》起笔于一场翻车事故，之后是周邵去见即将病逝的母亲。此外，第五章《人山人海》中特意用看新闻的方式提到了9·11恐怖袭击。这样的安排当然绝非偶然，这背后体现的是作者对于文学本身和现实人生的思考。

为何路内要在《雾行者》中书写如此多的灾难？铭刻民族记忆，唤起生命意识，抚慰生者是灾难叙事的意义。萨义德认为，铭记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苦难中的艰辛，强化其记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且，书写苦难的经验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sup>[4]</sup>路内小说中的灾难叙事即是如此。

《慈悲》里苯酚车间产生的有毒气体，很多工人因此患上癌症，对人而言这是无处不在的恐惧。这种恐惧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

灾难叙事在路内《雾行者》中的直接表现是人物时刻与危险相伴。可以说，《雾行者》整部作品都与“危险”相关。仓库管理员的职业看似很安稳，但因为掌握着放货权，反倒是“高危”职业。小说中有多位仓库管理员意外身亡，或犯罪跑路。周邵、端木云也因为放货的问题被人用枪指过脑袋。各种打架斗殴、偷盗、威胁、绑票贯穿小说始终，仿佛小说中的人物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意外。强悍着不意味这安全，越是强悍的人在《雾行者》

中越容易出事。擅长打架的杨雄被猪仔捅死，黑道大哥一样的叶嘉龙被枪杀，强硬的邓文迪、王宏卫死于非命。气候也是《雾行者》中营造危险氛围的关键要素。小说第一章以“暴雪”为名，大雪压塌了周邵的住所，众人也因为大雪被困在铁井镇。“雾”也是小说的核心要素，周邵和辛未来被人追杀，那场在大雾中的逃亡颇有些亡命天涯，走到哪算哪的意味。作为小说题目的“雾行者”本身，其字面含义在雾中前行，前路未卜，不知道自己一下秒会遇到什么，自然是危险重重。直到小说的最后，作者还特意写到开车时车轮子脱落这种小概率事件，《雾行者》对危险的刻画可谓“有始有终”。

《雾行者》中时刻存在的危险是为了营造“不确定感”，反映的是这一时代人们的生存境况和心理写照。《雾行者》的时间跨度是1998-2008年，如同进入深水区的改革，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和社会都充满不确定感。凌明心、辛未来、李丽莎、胡小宁、沉铃、玄雨、飘飘、海燕、姚隼，吴铭瀚，一个个人总是突然出现又消失，因为大概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奔向何方。在《慈悲》中路内选择让人物魂归故里来消解现实的苦难，到了《雾行者》，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人们依旧奔向远方。我们被命运带走，好过被命运抛弃，林杰这样说道。雾中的行者，其实也是路内自己。路内思考的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社会中，人将何以自处。

#### 四、结语

时至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70后”已经或即将进入50岁。知天命之年是人生的重要节点，对于作家而言，这也往往是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对于“70后”作家的经典化问题，也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青年、中年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往往是比较模糊的，其边界也在不断浮动变化中。社会学意义上，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年龄分段，45至59岁为中年人；而在文学意义上，中年作家相较于青年作家则多了一层“久经沙场”与日臻成熟的意味。路内适时捧出的《雾行者》这样一部近50万字的厚重作品，也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路内写作的成熟，是其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 【参考文献】

- [1] 路内.雾行者[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561.
- [2] 张楚.我和我居住的县城——自述[J].小说评论，2016（5）：71-72.
- [3]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M].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9.
- [4]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陆建德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56.